诗坛筑青溪 文以水为盛

章用秀

贺家口引河,位于天津市区的南部,是津河的主要部分。这条河虽不像海河那么悠久和显赫,却也承载着可圈可点的人文故事。

贺家口引河最早见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津门保甲图说》。据清同治九年(1870)《续天津县志》记载,系乾隆五年(1740)至三十六年(1771)四次挖掘而成。这条河东起海河,西至八里台,其两岸村落大都建于明清时期。《津门保甲图》即清晰地标有贺家口、小刘庄、东楼庄、西楼庄、小王庄、佟家楼、五窑(吴家窑)等。早年,这一带的人多以耕种为业,少有小商。清康熙、雍正年间,河畔有位童葵园,“买负郭田数亩,取风人之意,以‘闲闲’署其斋,日事吟咏,即以‘闲闲’名其集”(《津门诗钞》),这当是佟楼村最早的文人。

从文化地理的视角来看,昔日的贺家口引河颇能体现津沽高雅文化的传承,以及天津文化艺术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20世纪初,这里老柳低垂,一河如带,池塘坑洼遍布,积水深深,芦苇丛生,一条条鱼儿游动,一群群水鸟栖息,时常有一只小船载着人们前来游憩,被人称为“小西子”。而河流又往往是文化的“根脉”。此时,天津和寄居天津的一些文人学者、诗家词人都看上了这块宝地,“曲水流觞,群贤毕至”,结诗社词社,往还唱和,承接并延续天津的文人雅集之风,而使流风不坠于乱世,一时间成了诗词歌赋的“创作基地”。且因环境幽雅,一些富豪买办及亦官亦文的退隐之人多在河畔建私家花园和别墅,追求一种恬淡和自然的生活。从1936年出版的《最新天津全图》上看,贺家口引河两岸即标有丁家花园、澂碧园、梁家花园、管家花园、新农园、麦家花园等。没有标注的还有罗开榜的罗园、朱启钤的蠖园、蔡绍基的蔡家花园、倪嗣冲的倪家花园、雍剑秋的西湖别墅、张学良别墅等。这些花园一个接一个,几乎是连缀在一起的。或主人文化品位高,“结庐南郭南,心远地自宽”,或招引社会名流前来风雅聚会,承载着水西一脉雅文化的“绝唱”。

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由严修等倡导成立的城南诗社。诗社首先从恢复水西庄的风雅文化做起,再续水西文脉,天津地方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几乎全部参与诗社活动,形成天津近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文人群体。而“城南”之名即取自雅集地天津城南今津河之畔的八里台,“复昉乎浴沂风咏之例”。社集之日,荡舟赏景之外,多是分韵赋诗,斗棋赌酒,有时亦为射覆、敲钟之戏。“城南诗社人,最喜城南游。”从《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中看,仅严修描写八里台旖旎风光的诗作就不下六七首。其《八里台归途示诵洛》写道:“夹岸丛芦一色青,橹声续续水波澄。故乡风景君应记,略似西兴到绍兴。”城南诗社的另一位骨干、津门学者王守恂的《王仁安集》中也收有《八里台秋泛分韵得雨字即呈诸公》等诗作。该诗在回忆他当年任钱塘道尹时居西湖畔放舟探幽之后,深情地写道:“惟此八里台,仿佛旧莲浦,秋高爽气来,招邀载清酤。”严修、王守恂都是被近人汪国垣列入《光宣诗坛点将录》中的人物。他们的诗作不仅光大了水西庄的文化传统,也为今天的津河八里台这一风景之地增添了光彩。

如前所云,为便于乘舟小聚,不少文人雅士还把别墅建在佟楼附近的津河即旧贺家口引河两岸。夏季来临,每天到此乘凉游憩的舟船多达二十余只,南北文人的“龙潭聚会”再现了当年水西庄的风雅。

成立于1930年前后的诗词团体须社,由擅经史、精诗词的闽侯籍学者郭则沄主持,成员也多是客居津门的南方籍学者。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今日的津河之畔;循河乘舟,填词联句,常常是词侣们的“活动形式”。《烟沽渔唱》汇集了须社词人的数百篇词作。该社发起人之一、无锡籍学者杨味云的《云在山房骈文诗词选》中就收有相关之作,诗中“红藕将残,白萍未老,柳丝冉冉,犹带斜晖”的佳句,使人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这里水乡的清新和野趣。在诗中,人们似乎闻到了花的芳香、水的气息,实在令人神往。在此期间,高凌雯的“城南绿水抱村流,曾共诗翁一放舟”(《刚训斋集》卷十二),冯文洵的“楼台俯青溪,烟景似江左”,“新涨一篙碧,疑人天上坐”(《紫箫声馆诗存》),也都是文人会集八里台、泛舟青龙潭的诗词名句。

当代作家黄裳在《榆下杂说》中曾提到他探访水西庄故地的情形:“记得五十年前在天津读书时,曾经到八里台左近去过,也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的原址,但见高柳垂荫,一溪环绕。”黄裳所到之处不是水西庄故地,而是八里台一带。但他的话恰恰在提示我们,今日之津河及八里台一带与水西庄在文化上确是相联而又相通的。

今津河南岸的新农园(也称观稼园)也是当年津沽文化的一大渊薮。园的主人管凤和诗书俱佳,文化素养非同一般。据称,华渡管氏人才辈出,其中管绍宁、管干贞、管世铭、管凤和、张致祥(管亚强)五人,堪称常州“管氏五杰”。管凤和常招饮文人雅士于其园中,赋诗作书。从前人诗中可知新农园的美景:茅屋草舍、石笋假山、松树农田、长廊流泉。诗人张玉裁1927年有《秋日宴集观稼园分韵得客字》云:“斜穿吴窑村,忽见幽人宅。环以衣带水,虚室能生白。”陆文郁先生在《天津书画家小记》里说:“管凤和字洛声。武进人,寓津,家焉。喜书法,又为名诗家。于八里台居住,临水建‘新农园’。与严范孙等组织城南诗社,每当春秋佳日,聚津地内外名诗家于其园中,为吟宴畅游之叙。洛声务农事,于园中养蜂多箱,取蜜分房之事,躬自为之。又养‘来客亨’鸡,‘安国乐’兔,勤劬处理,兴致勃然。郁曾两次至园参观,布置井井,俨农家也。洛声和易近人,无名士骄矜之习。”罗园与新农园相邻,是罗开榜的私人园林。罗本是军政人员,辛亥革命后皖系北洋军阀的重要骨干,曾官至北京政府陆军部次长,代理总长。然此人性喜植菊,退隐后在河畔建园,培育菊花,有“罗园艺菊数千种”之誉。罗亦好客,于是罗园也成了文人雅集之所。宣统皇帝的老师陈宝琛、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小说家刘云若、报人王小隐、《北洋画报》创办人冯武越等都曾到罗园访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洋画报》即刊有多首名人在罗园观菊咏菊的诗词佳作。1928年,著名学者、古文字学家唐兰来罗园,颇有兴致地说:“罗园菊花,尽态极妍,主人终岁之勤,仅乃得此。余当数过其间,流连忘返,偶以诧诸小隐(即王小隐),小隐欣然,并约诸友同往,武越(即冯武越)且摄景若干而归。园近佟楼,小隐为数丰雪故事,闻所未闻。”游园归后特作《罗园观菊》诗,赞罗园菊花的清雅与妍美。

八里台附近的水香洲,津西胜芳籍张镒先生1934年所建。郭则沄《清词玉屑》有多处描述这里的风光水色:“津南八里台亦曰八里潭,水村缭绕,多植芰荷,老柳带之,风景佳绝”;“八里台畔有水香洲者,文安张仲钧观察别业也,临流结屋,夹水通桥,径出苔矶,林藏花坞,中有沧近居、一沤亭、三十六陂吟馆诸胜”。美丽的世外风光吸引了众多文人前来游赏。天津籍文人赵元礼(幼梅)、李金藻(琴湘)、徐兆光(镜波)等,客居津门的陈实铭(踽公)、郭则沄(蛰云)、杨寿枏(苓泉)、许钟璐(珮丞)、胡宝善(楚卿)、侯毅(疑始)、陈中岳(诵洛)、许同莘(溯伊)、管凤和(洛声)、刘春霖(润琴)、查燿(际午)等,都是水香洲的常客。水香洲主人与宾客一起描摹风景,抒发感慨,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们的作品被集成《水香洲酬唱集》四卷,由郭则沄编订刊行,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天津的古典文学。如杨寿枏《甲戌六月水香洲赏荷赋呈沧近居主人》等皆脍炙人口,水香洲风韵跃然而出。津人徐兆光有《沧近居记》,把园林兴废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指出水香洲兴盛对传承天津文坛风雅的重要。

水香洲建成两年后,张镒便去世了,水香洲亦随之衰败。七七事变后,新农园、罗园等亦大多毁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而须社的最后一次雅集是在1931年。只有城南诗社,天津沦陷时一度衰歇,光复后再次振起,延至20世纪50年代初。

20世纪50年代后,佟楼、八里台一带,文化设施纷纷建成,津河两岸依然是天津的一方“文化高地”。

人民装扮着津河,津河铸就了文明。人民离不开津河,津河造福于社会。愿津河与天津人民同生共长,展翅高飞,共创辉煌!

(此文为《文苑风流津河畔》一书自序,该书已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金圆券收兑工作

天津解放的故事(十一)

刘凤华

天津自民国时期就已成为北方金融中心,日本侵华后期及投降后,天津的商业、金融业辐射东北、西北乃至华中等地,地位仍旧无可撼动。加之天津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如金圆券、边币、东北券、美元、英镑等,因此,天津解放后的金融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庞杂。收兑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建立以人民币为主体的货币制度,成为天津解放初期金融战线上的重要一环。

早在天津解放前的两个月,人民政府既已调拨包括银行人员在内的925人,进行接管、收兑的培训工作和各项纪律、风俗习惯的学习。同时,接管金融方案也在商议,接收所需相关物资,例如卡车、粮食、布告、封条等均在准备之中。金融接管确定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指挥,包括新旧货币比值、资金调度、干部任用、货币政策制定等。

北平和天津是华北地区的两大城市,金融接管的基本任务是“兑换友币(如东北币、边币等非国民政府系货币),紧跟军政形势肃清金圆券,建立本币市场,进行反假工作,巩固本币信用”。在具体政策上,则是采取将平津外围地区和平津两市市内金融政策区分开来的方法,通过相关措施迫使金圆券向城市外围流动,再进行兑换,以减轻城市收兑工作的压力。

1949年1月7日平津外围货币工作方案确定,在对“友币”政策上,人民币与东北币在1:10的固定比价下,暂准其在临近平津地区流通;但对长城券、热河券以及带有热、辽字样的边币仍旧进行兑换,宣布比价,互不流通,争取集中收兑,避免市场混乱。在对金圆券的政策上,根据华北财政委员会决定,“新解放区乡村与城市之伪金圆券,贬低比价收兑金圆券,一面排挤一面收兑,迅速肃清”。具体措施是规定人民券与金圆券以1:5的比价收兑,奖励商民携带金圆券至城市外围地区,兑换、购入所需物资。基于上述城市与周边地区分割的金融政策,人民银行组织人员成立兑换组,确定各城镇兑换地点后挂牌兑换,同时还设置收兑范围,东至塘沽、葛沽、咸水沽、小站、小王庄、独流、杨柳青,北至柳墅、杨村车站,最终形成对天津市区的包围圈,除人民币、东北券、冀南钞三种货币外,其他一概不许进入市内。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成立。人民银行和军管处制定的天津金融工作任务是全力接收四大家族的金融机构与财产,建立人民的金融体系,肃清敌币,澄清金融市场,初步管理行庄,只办理紧急性和必要性的金融业务。

基于前述将金圆券“向周边地区排挤”和“一切措施对基本群众要有一定的区别”的政策,军管会出台多项金融政策,基本确定金圆券收兑方法和对下层民众的优待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根据当时物价及金圆券购买力,确定金圆券收兑比价为1:6,截止日期为2月4日;按照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牌价收兑;携带金圆券十万元以上者,出入天津周边地区需向海关或工商局申请,查核后封包盖章发给“敌币携带证”后方可出入;携带金圆券十万元以下者,向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各中心兑换组登记说明具体事项,由海关或者工商局办理手续;对于工厂职工、学生、农民、教职员、小手工业者、贫苦市民等,“取得本会派驻各该工厂学校机关及各该行政负责人之证明”,按照优待比价兑换,限期10日。所谓优待比价,是相对于平价而言,即平价为1:6,优待比价则为1:3。据统计,按照每人收兑金圆券250元计算的话,通过此项优待政策,天津市60万下层民众受惠。

虽然多项告示相继发布,但是基于战斗刚刚结束,消息不畅,人心不稳,金融市场仍旧动荡非常。银元公开叫卖,金银外币倒卖风炽,十几家私人行庄参与金银投机,各类货币比价涨跌剧烈,例如解放初期北海币贴水是10元,但最高时达到40余元。因此,刚刚解放的几天内,金圆券收兑工作较为混乱。1月16日军管会公布收兑比价为1:6,由于比价宣布时间较晚,且兑换机构和人员较少,只有罗斯福路(今和平路)中国银行办事处和河北省银行办事处2家,加之所需资金入津较慢,因此导致拥挤异常。19日兑换机构增至20个,20日兑换机构增至187个,拥挤状况才大为改观。直至此时,大宗交易还以白洋为媒介,一般物品则以金圆券计价。此后,随着兑换机构进一步增设,加之新旧货币比价保持不变,扫除了部分市民的留存、观望心理,收兑成果显著。据统计,这一时期大约收兑金圆券3.5亿元。

1月24日,收兑比价改为1:8。由于北平还处于国共和谈之时,物价下跌,因此携带金圆券至北平购入物资者增加,与此同时,逐渐组成团体的优待兑换也在增加,因此人民币在货币市场逐渐站稳脚跟,并成为主要计价单位。26日,收兑比价改为1:10,而优待比价一直保持1:3,收兑工作进入尾声。

截至2月4日,共收兑金圆券5亿元以上。5日各兑换所撤销,零星兑换由人民银行办事处负责。此前,根据保定、济南等城市的收兑经验,预计天津收兑工作将需要20天,但实际仅需10余日,收兑工作提前完成。金圆券得以迅速肃清,原因之一是前期准备相对较好,先后发出9则布告,便于群众了解信息,同时博取了群众好感;原因之二是兑换机构的快速增设;三是经过解放初期几天的混乱后,通过电台、广播、报纸等方式,及时公布和宣传政策方针和工作进程,发挥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天津的金圆券收兑工作也存在一些经验教训。首先是应急工作存在不足,表现是1月16日宣布收兑比价,17日就开始收兑,加之资金、人员供应不足,造成拥挤和混乱。其次是初期收兑机构数量不足,存在对旧邮局、行庄、银行的不了解和不信任,直至19日军管会方才通过商会、银钱业公会,利用私人银号、旧国民政府系银行职员进行委托收兑,收获市民好评。再者,收兑过程中,与“工商贸易等部门缺乏联系,工作中缺乏经验交流”,如果通过发放工资、收购物资等方式进行收兑,物价下落时用人民币收购物资,既可稳定物价,又可占领货币阵地,壮大国家资本,一举数得。

天津作为北方的金融中心城市,其在接管中遇到的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和方式方法、所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均为此后接管其他城市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沽上丛话

满庭芳

第四八四五期

春天到青城去问花

朱晓剑

成都的春天,花朵慢慢绽放,走在城市或乡村,均可看见种种花儿竞相开放,故对成都人来说,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追花季。梅花、李花、海棠花、梨花、桃花……难怪杜老夫子喜欢地说:“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不过,成都人今年大多数是“就地过年”,在家呆了数天时间,假期中刚好有花可赏,爱游逛的人自然愿意去看一看。刚好都江堰的问花村,在空旷的田园里,有各种花儿应季开放,也就吸引了无数的人。在朋友圈,也是有着这样那样的照片,似乎不去问花村,就白过了这个春节。

问花村是青城山下的一个小村落,此前可谓名不见经传。我想起苏东坡的《述古闻之明日即来坐上复用前韵同赋》:仙衣不用剪刀裁,国色初酣卯酒来。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2019年也才是趁着乡村振兴的春风打造的一处赏花园林。都江堰的诗人、作家没事就去走一走,写出了颇为绚烂的文字。那时我并没有动心去问花村,只是作为旁观者看在文人的笔下花开花落。

像问花村这样的赏花地,在成都的周边还有许多处,哪怕是采风活动,也是让人觉得应接不暇。梅花、李花、海棠花、桃花、梨花、油菜花、樱花……似乎每一种都是花节了。如果喜爱植物或鲜花,几乎整个春天都可以在成都平原肆意游荡,追寻花的脚步。只是不少地方没有像问花村这样成为综合赏花的所在罢了。

有一天,几位朋友约着去青城山,目的地却是问花村的隔壁,因此也就自然地去逛一下。这种无心插柳的探访或许更具意义。于是,就和朋友走过去。还没进入村庄,在青冈路旁已经看到成群结队的游客,路的两边已摆上一些饮食小摊,凉粉凉面少不了,还有一家卖爆米花的小摊,路的两侧新修建了人行道,且在其旁边树立了一些宣传牌,如梅花、海棠花、太平花的故事,以及张大千、陆游与青城山的故事介绍,看上去很不错。过往的行人对此视若无睹,说说笑笑走过去,也是,花儿的魅力比这个要大得多。

这时候的问花村,主要是观看梅花,单是梅花,就细分腊梅、情人梅、造型垂枝梅、梅花花千骨、盘龙盛世、游龙飞天、梅林花海等点位。我们进入村庄之后,四处游走,到处都是人,尽管梅花将尽,却还是挡不住蜂拥的人群。

走在梅树下,已见些许凋零的梅花,还是挡不住人们的热情,在花树下拍照,我还是想象其盛开的样貌是何等的吸引人,以至于许多人来此问花呢。看了这样的场景,我却并没有拿起相机拍下这些场景。确实,我对逛风景的兴趣减少了许多,倒是对人文之处多一些关注,比如这里有传承十二代的周家粉房,已经濒临失传,想来不免让人感叹。仅仅是看花,少了这种历史底蕴,似乎显得轻了许多。

不少游逛者似乎对此也没多大的兴趣,毕竟是逐渐消失的事物。我想在问花村应该还有许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这里原住民的生活,在乡村旅游发展的今天,是不是生活观也发生了许多改变?这样的想象也甚有情味。

从村庄里走出来,一波波的人群走进去,我想每个人在这里“问花”,所得到的答案也是迥异的。要知道,即便是同一朵梅花,在这里也有无限的情趣,只是我们以怎样的眼光去看罢。当我们看过了太多的花,见过太多的人,反而追求一种纯朴的思想,总是想在平淡的生活中看到不同。

蓟州山居(中国画) 郑二岭

74 巡视员的凛然形象

革命者

何建明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死后,不要治丧,因为这是浪费的,以后你们能继我志愿,

乃我门第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继我志愿,则万不能与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同流。

现在我的心很镇静,但不愿多谈多写,虽有千言万语要嘱咐你们,但始终无法写出。

好!弟妹!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结了!

你们的大哥砚芬嘱

这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者走向死亡前写给年龄尚幼的弟弟与妹妹的遗书,看后令人泪下。

史砚芬临刑前,他的同室难友贺瑞麟在《死前日记》中记录下了史砚芬生命最后一刻的英雄气概:“今日六时,史砚芬、齐国庆、王崇典几位同志……拖向雨花台执行死刑。砚芬临行时,身着到南京来的青绿色直贡呢夹长衫,汉清送给他的白番布胶皮底鞋、白单裤。因为刚洗过脸,头发梳的光光的。他第一个先出去,神气最安逸……砚芬临去时,向我们行一个敬礼……‘再会’。”

这就是一位年仅25岁的革命者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凛然的形象!记录下这一幕的贺瑞麟比他的战友还要年轻,才19岁。他的《死亡日记》从入狱后的9月29日开始写起,只记到10月5日,入狱仅一个星期后,贺瑞麟也不得不将《死亡日记》悄悄塞给同室的另一位难友,自己则像史砚芬一样,大义凛然地走向了雨花台……

李济平,是另一位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往南京、镇江、常州等地负责指导工作的江苏省委巡视员。与史砚芬的经历完全不一样的是,李济平有过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经历。这位父亲是清末秀才的江阴才子学习特别优异,所以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听说国内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坚决要求回国革命,而党组织此时已经决定让他到炮兵学校进修。“学习固然重要,革命工作更为重要,何况国内急需要人。”他这样向组织坚决请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李济平的请求获得批准后,他用先贤的诗句勉励自己投入血与火的国内革命斗争之中。在他之前的几任巡视员已经牺牲在征途之上,李济平清楚地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危险境地。那时的巡视员不仅需要准确了解所巡视的地区党组织的基本情况和重要事情,还有一项更艰巨的任务是,按照上级要求,亲身去某个地方完成党所布置的特殊任务。如李济平在上海接受组织交代的任务是:在敌人的心脏——南京开展暴动。

这是要杀头的事。巡视员必须冲在最前面,去指导和领导当地组织实施相关的行动,同时还要把执行过程中的情况及时汇报给上级组织。经常化装成不同身份的人,短时间内奔波于几个城市之间,执行完成不同的任务……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巡视员”所要做的事。

(全文完,有删节。明日开始连载《大河初心》。)

22 首届漫展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能够跻身首届全国漫画展的参展画家行列,说明冯棣已经凭借自己的漫画创作以及《大公报》上海版的传播优势,在中国漫画舞台上拼得了一席之地。因为参加这次展览的漫画家,近乎一百人。经过筹备人员的审查,只有八十余人入选。而落选的原因,并非由于技巧水平达不到参展要求,而是画展主办方对题材方面的选择非常严格。参加筹备本次漫画展的都是赫赫有名的漫画家,如:“王先生”的作者叶浅予,“诸涛山”的作者王敦庆,“牛鼻子”的作者黄尧,“孔夫子游上海”的作者高龙生以及构成派的漫画家张正宇、张光宇兄弟,纯西洋画风的漫画家郭建英,抒情派的漫画家丰子恺,剪纸和中国卡通风格的漫画家万籁鸣……参加这次画展的画家虽然只有八十余人,但却代表了来自冀、粤、桂、闽、浙、鄂、豫、湘、沪、京(南京,笔者注)、平、津等地的漫画家。从漫画的性质上看反映社会内容的作品比反映政治内容的作品多,形式上彩色的比单色的多。参展作品最多的是广东的桦橹和上海的叶浅予,各有七八张。

在记者采写的新闻中,列举了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张光宇《漫画会开幕》,鲁少飞《洪福齐天》,高龙生《国破山河在?》,江敉《洋货中国》,王竹生《五十年的中国》,杨绍万《北方近代风景》,刘一《同赏日蚀(食)图》,林道厂《国人的毛病》,窦宗洛《王道乐土》,陈乃勇《禁烟》,张宗濂《举头红日近》,黄复生《寒江独钓图》。其中记者标明名家的作品有:鲁少飞《洪福齐天》,叶浅予《游泳池》,张英超《夏国之王》,汪子美《京沪漫画家》,黄尧《老寿星》,张亦庵《潘金莲》,曹涵美《金瓶梅》,胡考《舞》,冯棣《“万能博士”大冲锋》,张乐平《艺术欣赏者》,王敦庆《印度太太秘密谈话》,张正宇《肉感的美人》……冯棣赫然以“著名漫画家”位列其中。

张道梁先生经过研究曾得出一个结论,冯棣的画多在1936年上海《大公报》发表,1937年就少见了,虽仍有题头画,已经换了风格,因为此时冯棣已经离开上海北上返回了天津。冯棣晚年曾对学生提及自己不在上海发展而到北方来的原因时曾谈到,自己觉得在上海发展竞争不过叶浅予等已经家喻户晓的漫画家,因此考虑北上,回到京津打开自己的一片天地,这或许是冯棣非常明智的选择。

1936年12月8日,冯棣为通俗读物编刊社绘制的《枪毙白面犯》宣传布幕,大约二百平方尺,即将悬挂于北平前门,用以警告吸毒的同胞。冯棣再次告别上海,北上京津,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发展道路。

117 来子给傻四儿帮忙

烟 火

王 松

作家出版社

李秃子是爽快人,说,傻四儿虽傻,也有个傻心思,他不好意思直接跟来子说,所以才央他过来,意思是,来子要是一时半会儿还没事干,是不是就别走了,还在水铺帮他挑水。李秃子说着自己也乐了,又说,也难怪傻四儿不好意思跟你说,他的意思是,工钱没有,也就管个饭。

来子一听笑笑说,这有嘛不好意思说的,管饭就行。

李秃子立刻连连点头,我就说么,你不会不答应。

从这以后,来子也就正式来水铺,给傻四儿挑水。

傻四儿嘴哑,腿瘸,人却勤快,也爱干净。这“吉祥水铺”虽然只有一个床铺大小,垒个大灶,再放两口水缸,也就转不开身儿了,但傻四儿收拾得一尘不染。傻四儿跟来子比划着说,这烧的水是入口的东西,脏了谁还敢喝?但水铺的房子年久失修,一下雨就漏。这年一进六月,又连着下了几场雨。天一放晴,来子就赶紧给水铺修房。来子当年跟着他爸老瘪拉拔火罐儿的坯子,筛土和泥都在行,又去海光寺的农户那儿要了点麦秸,回来剪碎掺在泥里。忙了一天,总算把房顶又重新抹了一遍。傍晚,傻四儿过意不去,冲蹲在门口洗手的来子比划着说,要请他去包子铺吃“狗不理包子”。

来子听了笑笑,也没推辞。

包子铺这会儿正上人。这时高掌柜已把生意交给儿子。但生意交了,还不放心,一到饭口就来前面盯着,唯恐有闪失。来子和傻四儿进来时,王麻秆儿喝着稀饭在说外面的新鲜事儿,说下午从河北的大经路回来,路过金钢桥时,看见海河里的水已平槽儿了,早晨过去时还不这样,不到一天工夫,就涨了四五尺,照这样涨下去真要发大水了。正吃包子的人一听,都有点儿慌。有人问王麻秆儿,海河边的防水墙有没有人看着。王麻秆儿说,看是有人看着,可水这东西能看得住吗?老话说,水火无情,上游再下来水,冲开防水墙也就是一眨眼的事儿。这时旁边的马六儿不爱听了。马六儿这两天生意不好,街上人心惶惶,已经没人打帘子,心里正没好气。就横了王麻秆儿一眼,哼着说,要想喝稀饭,就说喝稀饭,为了白喝一碗稀饭费这么大劲,值当的吗?王麻秆儿听出马六儿这话里有骨头,就回了一句,大河又没盖盖儿,你不信,自己看去啊?马六儿又跟了一句,为一碗稀饭,就让海河发大水,也太邪乎了!王麻秆儿一听这话急了,把脖子一伸说,海河是我家的啊?我让它发水就发水?说着把碗一蹾,脖子一拧,我要真有这本事,就不在这儿喝这个稀饭了!

高掌柜一听这俩人越说越饿,就过来说,是啊,要这么看,今年这水还真有点儿悬。